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4)05-0071-04

# 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塑社会信任的策略研究

杨岚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社会中的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社会底层民众往往遭遇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劳动关系的紧张对立和社会信任度的降低带来了潜在的社会危机,加剧了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要重塑社会信任,就要加强社会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致力于劳动力非商品化回归,确立发展型、能促型政策理念,促进社会改革目标的序列递进,加大社会投资力度,加快民主进程与政治改革。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信任;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12.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4.05.014

当代中国经济绩效大幅提升的同时却又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但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极其贫乏,这种状况造成底层劳动者缺乏发展的基本资源,丧失了发展的机会,进而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对立,甚至引发了诸多冲突。因此,通过社会政策调控来重塑社会信任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拟在对我国社会信任资源不均衡分配造成信任剥夺与信任排斥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塑社会信任的社会政策建议。

## 一、信任及其不均衡的分配方式

信任问题是当今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但学界关于信任的定义众说纷纭,已有200多个定义。本文以孔凡义的信任定义界定为基础,展开讨论。

### 1. 信任的界定

学者孔凡义<sup>[1]</sup>对学术界对信任的界定视角做了如下4种概括:一是心理学取向——信任是个人心理反应,是个人对他人和外界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行为;二是社会学取向——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产物,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算计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三是文化取向——信任的目的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信

任是社会简化机制(卢曼<sup>[2]</sup>);四是管理学取向——信任是在有风险的情势下,对他人的动机报以积极、自信的期待状态,是一个行为者评价其他行为者或行为者团体实际行为的主观可能性程度,评价在对该行为进行监控(或根本不可能监控该行为)之前和于该行为对其自身行为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行。

### 2. 信任带来的社会收益

从对信任的界定看,信任作为一种资源给社会带来诸多好处,是一种“投资组合管理”,是一种权力节约手段,信任的存在缓解了行为者的担忧、疑虑、警惕和戒备,并从监视他人日常行为细节的高代价的措施中摆脱出来<sup>[3]</sup>。卢曼将信任作为复杂社会的简化机制,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人类永远无法获取社会交往中的完整信息,因此需要通过信任来弥补理性的不足,增强社会成员内心的安全感,并在信任关系的建立中获得确定性,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稳定和谐。<sup>[4]</sup>可见,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同时又是自信的体现。信任他人意味着信任者愿意且能够承担因背信而受到伤害的风险。信任能带来福利,减少复杂性。一个能够促进牢固信任关系的社会,能够以更少的管理获取更多的自由,能够应付更多的意外事件,激发公民的活力和创造性,减少以规则为基

[收稿日期] 2014-07-23

[作者简介] 杨岚(1973—),女,河南省开封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福利。

础的协调手段的低效率,并提供更强的生存安全感和满足感,带来更多的社会宽容和体谅。

### 3. 信任资源不均衡分配的结果——信任剥夺与信任排斥

信任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益处,但信任资源的分配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是不均衡的。富有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而那些穷困的和受教育较少的人往往遭遇不信任。信任更容易使人为了集体行动的目的而联合起来,而不信任往往会阻碍集体行动。信任作为能够带来利益的生产性资源,在贫富阶层中不均衡地分配着,底层民众往往缺乏信任,容易受到背信的伤害,但又最需要信任支撑其脱离贫困,信任的马太效应不言而喻。

## 二、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加剧了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

### 1. 社会信任的变迁

马克斯·韦伯提出,信任包括特殊主义的信任和普遍主义的信任。特殊主义的信任是指信任的确立是以特殊的亲情如血缘、亲戚、朋友、地域等为基础,并以道德、意识形态等非制度化的东西为保障;普遍主义的信任是以信用契约或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双方严格遵守信用契约是维系此种信任的关键。中国传统信任是由以家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提供,是基于熟人社会而造就的特殊信任,这样的信任在传统家庭作坊等工作场域内发挥着凝聚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作用,但其弊端在于大型成熟的现代企业难以成型,经济社会交往合作的时间和空间受到掣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得到保护的同时,发展却相对停滞。<sup>[5]</sup>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信任的幕后场景已经变迁,社会整体已从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和抽象社会的场景之中,社会急剧转型释放了大量的不确定性。马得勇<sup>[6]</sup>指出,一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造成信任下降的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是社会的不确定性。社会变迁摧毁了传统的特殊信任体系,但新的信任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当前社会信任体系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在背井离乡日渐失去基于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人格信任的情况下,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缺少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支撑其形成普遍信任。

### 2. 信任剥夺和信任排斥的加剧及其后果

中国底层劳动者的工作形式是以非正规就业、维持性就业为主要特征。这种工作的非稳定性、非均衡性很强,流动性大,灵活就业多,工资低廉,缺少保障。同时,中国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脱离了原有的赖以生存的熟悉乡土,来到了充满竞争和劳动力商品化的陌生城市中,这部分社会成员构成了“缺场”的主角,对城市制度的依赖将大大增强。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社会的二元化体系并未根本改变,城市制度不仅没有保护这部分流动中的随时面临失业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利益,还造成了城市生活中对其巨大的社会排斥和剥夺,他们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诉求得不到重视,信任难得甚至被剥夺。底层劳动者的信任丧失不仅带来了重重危机,如劳资纠纷不断,政府和资方治理与监管成本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许多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虽会给予争取权益的劳动者以补偿,但劳动者也可能因为对政府和企业的不信任提出非分要求,一旦有人获得满足就会产生模仿效应,将社会治理带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 三、重塑社会信任的社会政策建设

福利制度理论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构建社会安全网,不仅能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以减少国民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市民参与(如工会的罢工、示威)。这样,一种普遍信任将在社会中逐渐恢复。<sup>[6]</sup>国家在通过社会政策调整、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重塑社会信任的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社会政策建议。

### 1. 加强社会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

培育底层劳动者的信任能力,需要自上而下从公共政策制定的顶层设计入手。当前底层劳动者信任能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整体转型造成贫富分化对立。社会转型中由于各子系统未能同步发展,从而造成种种失范现象,其中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社会政策被忽视,其协调社会利益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从而使底层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社会政策保护,社会日益分化成贫富差距巨大的对立阶层,进而造成劳动关系紧张,社会信任缺失。为重建社会信任和培育底层劳动者的信任能力,需要从宏观上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加强对社会贫弱者的扶持。同时还需要克服政策制定的路径依赖问题,以

往扶持贫弱者的社会政策多是作为经济政策的补充,现在需要突破原有政策思路,明确社会政策不仅仅是手段和工具,也绝非仅仅处于经济政策的附庸地位,而是需要放在与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甚至于优先考虑的位置。只有通过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统筹筹划,才能有效地避免因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被推向社会边缘,也才能避免他们因被社会不信任而丧失自信和信任他人的能力。

## 2. 转变社会政策权利观

我们要致力于保障劳动者的权利,承认和尊重所有劳动者的权利,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要有代表权和参与权,并且要有健全的法律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要通过扩大社会保护确保劳动者拥有良好的工作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提高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缺乏社会权利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人的异化——工人成为商品,人们将成为他们自己所不能控制的权力的俘虏;即使是疾病这类微不足道的社会偶发事件,或是商业周期之类的重大事件,都能摧毁商品于反掌之间,劳动力将暴露于无法抵御的社会风险当中。马歇尔的公民身份及社会权利理论指出,社会公民身份带来的权利将解决劳动力商品化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消融阶级差别。<sup>[7]</sup>公民权利的基本含义是平等,即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法律、人身自由、政治及基本生活待遇保障的权利。公民权利的落实和公民身份的平等有助于受到自由市场竞争淘汰的弱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少量经济福利以至社会生活待遇的平等可有助于磨平自由市场产生的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及政治矛盾。<sup>[8]</sup>因此,中国社会政策应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保制度的安全网络覆盖面,建立适度普惠的社保制度,加强社会保护,比如失业保险制度的健全。这将不仅使劳动者能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精神领域有安全感,对社会有信心,而且还能够降低人们的储蓄动机,鼓励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 3. 确立发展型、能促型政策理念

我们不仅要给劳动者以权利,还要通过积极福利来创设底层劳动者参与工作和获得更好工作的机会,并使其在参与中发展自身能力。应以培养社会中产阶级为目标,通过能力养成正面引导底层社会成员提升劳动质量和劳动层次,在社会地位上向中产阶层靠拢,使劳动者在劳动、自立和自尊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成为自我能动的社会人。与之对

应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亦应循以下思路展开:强调多元化的政策路径,通过家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渠道的社会政策干预作用于个人能力的提升,投资于人力资本。应以起点干预为战略重点,加强贫困者的资产积累;强调生计的思路,认识到底层劳动者也有自己的长处、财产和能力,可以被动员起来积极地参与发展的过程;通过社会政策影响底层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为其创造发展能力的平等机会;培养其“经济认知能力”<sup>[9]</sup>,提高其管理财产、利用财富创造财富的能力;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政策,通过提高其劳动力素质促使其获得较高的社会回报。

## 4. 推动社会政策战略目标的序列递进

基于中国现实的理性选择,社会政策本土化战略目标应循着渐进发展步骤,将保障就业作为低阶目标,将推进“体面劳动”作为提升工作质量的高阶目标。首先,社会政策应引导调整就业结构,在公共服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如社区服务、老年人照顾等。其次,社会政策还应引导“体面工作”的整体开展。体面劳动<sup>[10]</sup>是由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合作伙伴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共同提出的,其重点在于:公平的全球化、减少贫困、社会保障、社会融合和尊严。体面劳动的目标与社会信任的理念高度契合,与社会信任的塑造紧密相连,体面劳动伴生的和谐劳动关系与高度的社会信任互为因果。体面劳动旨在提升底层劳动者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消除贫困,为其带来安全感、尊严和保障,强健社会的中产阶层,使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自信和自尊,增强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避免脆弱性。当这一切达成之时,劳动关系得以调和,劳动者在有能力给予信任的同时得到信任,从而成就一个良性的信任体系。为实现体面劳动的总体目标,需要国家出台相关社会政策,引导企业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效益,在促进就业、保障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劳动保护、薪酬、培训教育与个人发展等方面确定国家标准,并对落实到位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应设置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的三方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在制度化渠道内实现利益表达,以制度机制保障来不断推进体面劳动的远景目标逐步实现。

## 5. 加大社会投资的社会政策取向

要加大社会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家庭、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的投资。国家在投资政策上要更加向社会领域倾斜,在社会管理中加大支持力度,推行“资产社会政策”。高夫<sup>[11]</sup>的社会开支回流理

论指出,社会开支的增长不一定损害福利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国家支付给个人的现金给付是一种“社会工资”,可以直接提升社会成员的购买力,有利于市场部门的循环运作。社会工资的正外部性收益明显,对现在和未来劳动力的再生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给付与服务能够“回流”到生产和流通领域。米奇利<sup>[12]</sup>主张应实施投资取向或生产主义的社会项目,社会福利开支可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实现社会开支的经济回报和成本效益,并促进社会成员自立自强。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迈克尔·谢若登教授<sup>[13]</sup>提出的“资产社会政策”,也再次论证了加大社会投资是事半功倍的政策手段,“资产社会政策”是通过政策广泛和普遍性地促进公民和家庭尤其是穷人获得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以增进他们的福利,为劳动力尤其是穷人发展能力奠定最基本的经济和物质基础,具有生产性政策特征,是从源头培养劳动力的能力。

#### 6. 构建“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

社会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政策相关方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政策走向,往往会出现因受强势利益集团的绑架而置换目标的现象,以保护和扶持贫弱者为目标就会被弱化和淡化,社会政策甚至会变形扭曲为有利于社会强者,导致马太效应。尤其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里,底层劳动者在政策制定博弈中由于缺少话语权,无法争取自身权益甚至受损,从而对社会政策本身失去信任。因此,为确保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底层劳动者互信关系的建立,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不信任”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机制的建立值得借鉴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做法:建立和推行确保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的制度。劳动者只有拥有了话语权,才有了争取工资和福利的权力,这种制度建立的目的是在于推进社会对话与矛盾化解,是对底层劳动者的可信承诺,有了这套机制的保障,也才能确保使底层劳动者遇到问题时相信诉之于这种制度化渠道能够寻求解决之道,而不是直接采取敌对态度或走其他非制度化甚至非法的程序。在当前中国社会

政策制定中,部分地区出台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就是重要的政策举措,同时加强工会的维权作用,给工会以一定的政治地位也应是今后的工作重点。这是社会政策制定中的民主进程,“在所有的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信任文化在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中比在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系统更有可能出现”,这一进程有助于在沟通中培养底层劳动者的信任能力,并重建社会信任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孔凡义. 信任、政治信任与政府治理:全球视野下的比较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09(10):123.
- [2] [德]卢曼. 信任[M]. 瞿铁鹏,李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
- [3] [美]马克·E·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9.
- [4] 董才生. 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J]. 学习与探索,2010(5):64.
- [5] [美]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84-99.
- [6] 马得勇. 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J]. 开放时代,2008(4):72.
- [7] [丹麦]艾斯平-安德森.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 郑秉文,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9.
- [8] 彭华民. 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5.
- [9] Weyers M 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Work: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M]. Potchefstroom: Keurkopie, 2001.
- [1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Decent work agenda[EB/OL]. (2014-03-10) [2014-05-10]. <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decent-work-agenda/lang-en/index.htm>.
- [11] Gough 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M]. London: Macmillan, 1979:108-117.
- [12] [美]詹姆斯·米奇利. 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M]. 苗正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02.
- [13] [美]迈克尔·谢若登. 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M]. 高鉴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